

太倉歷代碑刻

太倉博物館 編

文物出版社

歸玄來兮清息交以終極
世

太倉歷代碑刻

太倉博物館 編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201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倉歷代碑刻/太倉博物館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10-4855-7

I. ①太… II. ①太… III. ①碑刻—彙編—太倉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97806號

太倉歷代碑刻

編 著: 太倉博物館

封面設計: 程星濤

責任編輯: 竇旭耀

責任印制: 陳 傑

出版發行: 文 物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郵 編: 100007

網 址: <http://www.wenwu.com>

郵 箱: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榮寶燕泰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

開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張: 15.7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010-4855-7

定 價: 160.00元

本書版權獨家所有, 非經授權, 不得複製翻印

《太倉歷代碑刻》編輯委員會

主 任：潘井亞

副主任：陸 堅

主 編：朱 巍

副主編：邵 磊 徐 超

撰 稿：邵 磊 徐 超 葉伯瑜

錄 文：朱國良 趙桂溟 朱 巍 徐 超

覆 校：邵 磊 徐 超 朱 巍

拓 印：王鳴軍 張 軍 劉 斌

編 務：劉 劍 胡音堯 沈 丹 黃 輝

王 淵 陶永貞

序

面對靜靜地躺在我案頭的《太倉歷代碑刻》初稿，我想該為它說點什麼。

考古可以探索古代的文明，史官可以記載逝去的歷史，但對更多的當代人來說，全心全意與遙遠祖先溝通的主要管道是保存至今的文化遺產——那散落四野的文物古跡，那融入生活的戲曲歌賦。其中有一類既有史料之實、文采之華，又有鐫刻之秀、書法之美的不朽之作，便是歷朝歷代皆十分重視的碑刻，即刻於碑石上的文字和圖案。

碑從石從卑，原為刻有紀事、旌表、標記或抒情文字的石頭，後亦引喻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可以作為象徵或標誌的大事。碑刻往往記載的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史實，為歷代所尊崇，引為楷模，而石之質地又能永久保存，不易損毀。清顧炎武《北嶽辨》曰：“宋初，廟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因此碑刻往往與一個地方的發展、特別是比較繁榮的發展有着極大關係。不管是政治發端、城市發展、經濟繁盛、文化繁榮，或者是宗教興旺、文人風雅，只要桑梓有值得保留的紀事藝文，便往往會有碑刻遺留給後人，這是中國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方法和手段。

太倉是我的家鄉，有資源豐富、土地肥沃的自然地理，有風調雨順、旱澇保收的氣候環境，有糧食富足、紡織發達的經濟基礎，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因此，太倉建置完整，交通發達，文化繁榮，才人輩出。太倉歷史上曾為衛，為州，為縣，為市。元代太倉開發海運貿易成為“六國碼頭”，明代劉家港則成為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之起錨地，還有明神宗萬曆朝的內閣首輔王錫爵和他的後人們，明清兩代可與蘇州園林媲美的太倉園林，以及至今仍令人樂道的“昆曲”“婁東繪畫”“江南絲竹”……所有這一切，反映了自明中葉以來太倉富裕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其所依托的社會生活也有了初步的“小康”概念。

《太倉歷代碑刻》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樣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科學價值與藝術價值。這些碑刻主要以太倉博物館收藏為主，兼有太倉境域內其他單位保存的部分碑刻，有建築刻石、記事刻石、禁石戒石、紀念碑、界碑及藝文書法碑，是太倉碑刻的重要組成。全書分為紀事、藝文兩類，起於宋元豐五年（1082），止於1949年，其中明代以後數量、種類大為增加。其紀事重要者有延祐二年（1315）“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正統元年（1436）“鎮海太倉衛建學之碑”、嘉靖四十二年（1563）“整飭蘇松兵備河南按察司

副使熊公平海碑”、萬曆二十二年（1594）“明神宗諭王錫爵碑”、康熙十六年（1677）“江南蘇州府太倉州申嚴擾累柴米鋪行碑記”、雍正四年（1726）“江南太倉州鎮洋縣禁恤商裕課事碑”、雍正八年（1730）“奉憲禁勒運費碑記”、乾隆十七年（1752）“太倉州奉憲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同治十二年（1873）“太鎮賓興公車稟定漕忙提捐章程碑”、民國十二年（1923）“陳氏培遠義莊規條碑”。其藝文重要者有現位於明代建築王錫爵故居內碑廊中的碑刻，其中有皇慶元年（1312）“趙孟頫書《送友人李愿歸盤谷序》碑”、延祐五年（1318）“趙孟頫書《歸去來辭》碑”、明代刻“褚遂良書《枯樹賦》碑”、明天啟二年（1622）“王錫爵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御臨董其昌《心經》碑”等，文學和書法價值俱高。

作為首次編撰的代表地域文化的《太倉歷代碑刻》，本書碑石的收集、拓印，文字的辨識、考證、勘誤、校補等，編著者都付出了很多心血，為太倉留存了有關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謹此表示崇敬之意與感謝之情。

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南京博物院院長 龔良

2016年10月12日

前言

太倉，地處長江入海口的南岸，夙為“東南之富域”、“天下之良港”，而奠定這一基石的，當屬元帝國開發的漕運。漕運加強了南北經濟交流，拓展了海上貿易，加快了太倉農副產品、水產品和手工業品的流通和經濟的對外開放，使太倉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發展成為“漕運萬艘，行商千舶”暨“四方謂之天下第一碼頭”的東南大港。至明代永宣之際，為了耀威天下，敦睦邦交，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先後七次從太倉劉家港出發，揚帆西洋，又為太倉積澱了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精神財富。隨着經濟的繁榮，人口的遽增，太倉隨之也完成了從濱海集鎮到“朱門大宅，不可勝記，琳宮梵宇，列若鱗次”的港口城市的飛躍，為太倉種下了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文化基因，孕育了亦耕亦漁、亦工亦商的經濟格局。

太倉所在的蘇州，自漢末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中西文化交匯激蕩、社會生活豐富多彩、社會變遷得風氣之先的區域。由於蘇州歷來經濟發達，人文薈萃，故碑刻遺存特別是反映明清以來社會經濟類的碑刻極為豐富，相關的整理工作起步亦早。早在1959年，江蘇省博物館就編纂了《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共收錄碑刻370種；1981年，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了《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共計收錄碑刻258種，其中有100餘種亦見錄於《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一書；1998年，王國平、唐力行等編纂了《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一書，由蘇州大學出版社出版，據編者所述，書中“收錄蘇州碑刻計500件，其中除個別確有必要者外均為上述兩書所未收錄者”，而即便剔除其中的173件墓志，那麼該書所錄的地面碑刻也達到了可觀的300多種。蘇州地區碑刻之洋洋大觀，於此可見一斑。

不過，令人感到訝異的是，上述三種蘇州地區碑刻專集所錄的近千種碑刻中，明確屬於太倉地方的卻寥寥無幾。由此可見，太倉歷代碑刻對於相關的研究領域而言，仍是一塊有待開掘的處女地。有鑒於此，近年來，太倉市的文化、文物部門組織力量對太倉境內的碑刻進行了全面的調查與整理，並彙輯為《太倉歷代碑刻》這一填補空白之作。在即將付梓之際，我們想在卷首就本書的主要內容、價值與意義作一點粗淺的介紹，俾便利於讀者的閱讀與使用。

—

作為我國東南沿海第一大港，太倉東瀕長江，面向大海，境內河網縱橫。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舟楫已經廣泛使用。三國孫吳“乘海授淵”，開拓了海上交通。唐杜甫詠歎的“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便“屬太倉以循海道”。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曾出現過“四方爭議水利”的熱潮。有太倉籍水利學家、時任廣東安撫司機宜的邾宣，亦響應王安石的變法號召，於北宋熙寧三年（1070）上書陳述對蘇州水利的見解和建議。他認為，治理太湖流域的水利需“蓄泄兼論，整體治理”，並採用“治高田，蓄雨澤”“治低田，浚三江”的治水、治田相結合的主張，朝廷任命其為司農寺丞，提舉兩浙水利，負責治理太湖水系。邾宣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寫成水利專著《吳中水利書》，並着手興修水利，然遭誣罷官。回鄉後，邾宣堅信自己的治水治田主張切實可行，以家居西邊的大泗瀆作為水利實驗區，在大泗瀆四面修起圩岸，中間開挖溝渠排灌，並將自己經營大泗瀆的情形繪圖成文呈報朝廷，朝廷遂重新起用他並推廣其治水治田主張。邾宣的《吳中水利書》，是宋以後治理吳中水利的重要理論依據，至今對江南水利建設仍有重要參考價值。由於邾宣在水利方面為三吳人民作出的貢獻，人們曾為之建“邾司農祠”以資紀念。“邾司農祠”雖已毀圮，然邾宣墓與清同治八年（1869）整修邾宣墓時所立《重修宋司農丞邾公墓記》碑，今仍存太倉公園，碑文記述了縣志記載的邾宣墓位置，以及邾宣研究蘇州五縣水系走向等水文信息。

元初，由於東江、淞江相繼湮塞、淤淺，江南水滂為患。宣尉使朱清勸喻上戶（富家）捐資開浚瀏河，自婁門導婁江水，東駛劉家河入海，使水勢順下。其時，劉家河寬二三里，入海處逐漸開闊，潮汐洶湧，成為太湖洪波唯一的泄水通道，以致後來“清水急泄，不浚自深”，成為元代長江口重要的深水大港。保存至今的大量珍貴的古代石拱橋，可謂太倉水陸交通四通八達的實物見證，而鑲砌於橋身之上的碑記則是對這些石拱橋所具有的價值的最為貼切的闡釋。其中，時代最早的為南宋紹定年間的《改造惠安橋記》（本書第二號），碑文記述了武陵橋舊名惠安橋之淵源與南宋紹定年間邾氏募資改造惠安橋之經過，頗可補地志之闕如。而尤為引人矚目的包括興福橋、眾安橋等在內的國內少有的元代石拱橋群，其銘刻文字或與佛寺僧侶有關，或與地方神祇信仰有關，可謂探究太倉古代宗教及其影響的重要材料。此外，《重建稅

務橋碑記》記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建元代清河橋之事；《重建長安橋碑記》則記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建明代長安橋之事；而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新建西門外伯埧橋碑文》則記述了將連接太倉、昆山兩地的木構“仁壽橋”改建為水泥橋的經過，為了紀念捐資12000元作為建橋經費的里人王伯埧，遂將橋名改為“伯埧橋”。值得一提的是，《新建西門外伯埧橋碑文》係民國初年政治地位尊崇、書法造詣深湛的名流吳敬恒篆額、譚澤闓書丹，此誠伯埧橋之幸矣。

二

自古交通發達之處，亦為兵家必爭之地。明洪武元年（1368）設太倉衛，衛所官兵在防禦倭寇滋擾以及洪武七年（1374）隨靖海侯吳禎追剿倭寇至琉球大洋諸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洪武十二年（1379），為備倭又分太倉衛之半另立鎮海衛，2005年在原太倉孔廟舊址發現的明正統元年（1436）所立《鎮海太倉衛建學之碑》的碑額，即明代設立太倉衛與鎮海衛的實物見證。明代中葉以後，倭警頻頻告急，蘇州抗倭的形勢一度相當嚴峻，歸有光在《備倭事略》裡曾指出：“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昆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意謂劉家港是通海的港口，也是蘇州備倭的前哨陣地，而《劉家河把總邵公去思碑記》《劉家河把總玉江楊侯去思碑》《整飭蘇松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熊公平海碑》，則分別以傳主劉家河把總邵應魁、楊尚英與太倉知州熊桴為核心，鋪敘了中國軍民在東南沿海奮勇抗擊倭寇的種種事跡。其中，《劉家河把總邵公去思碑記》係著名書法家文徵明篆額並書丹，屬文徵明晚年的書法傑作，此碑曾以《文徵明書邵公去思碑記》為名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出版，夙有“瀏河鎮第一石刻”之譽。

至於《劉家河把總玉江楊侯去思碑》亦引人矚目。此碑位於太倉瀏河鎮天妃宮內，因碑文漫漶極甚，且傳主名諱與碑文作者題名皆泐損無存，故學界對其幾乎一無所知。值編者纂輯此書之際，始得以確認傳主即一代抗倭名將楊尚英。楊尚英猿臂善射，夙有決斷，待部曲有恩信。始倭寇作亂海上，尚英率部大小數十戰，多有功。以蘇淞參將而為浙江副總兵，官都督，世襲指揮。其最為煊赫之役，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於吳淞江出海處焚倭船六十艘，斬敵首級三百餘，故世盛稱楊將軍習水戰。楊尚英抗擊倭寇、守衛劉河功績卓著，去職後士民立此碑以紀其功勳，並贊其為“劉河之父”。另據《直隸太倉州志》卷十二《名臣》記載：

“楊尚英……歸創大第，治園池，握槊命詩，鐘鼓聲不絕。不五載產盡，歿無以殮。”謂楊尚英辭世較早，晚境也頗淒涼。與劉家河把總邵應魁相似，楊尚英亦與吳門最負盛名的書畫家文徵明有所交往，存世有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文徵明逝世兩個多月前的行書《元旦詩》扇，全文為：“元旦。勞生九十漫隨緣，老病支離幸自全。百歲幾人登耄耋，一身五世見曾玄。祇將去日占來日，誰謂添年是減年。雪後梅花春滿目，可容愁到酒樽前。徵明書，似玉江總帥一笑。”末鈐“文徵明印”“衡山”二印。見於款題中的受主“玉江總帥”，顯然即是與文徵明同鄉、號玉江的楊尚英。詩稱楊尚英“公餘賦詩有儒將風”，也豐富了對楊尚英為人的認識。

清初仍然沿用明代衛所軍制，於太倉設立劉河營。因劉河城堡傾圮，遂將營署從劉河舊城堡遷至茜涇，乾隆三年（1738）又移劉河舊城堡磚石築茜涇城，並重建劉河營營署於茜涇城。後以劉河口海防艱險，復於劉河口南側江堤邊用巨石壘砌高臺，建水軍署，俗稱閱兵臺。閱兵臺建成後，曾予重修完善，成為長江口舉足輕重的軍事要塞。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修茜涇城碑記》、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太倉州修城建樓記》與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創建閱兵臺記》（篆額為“建造閱兵臺記”）對此有頗為詳明的記述，可資與地志相互參詳印證。

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蘇南除鎮江、上海外盡歸太平天國所有。滬上官紳集議求救於曾國藩，遂有太倉鄉賢錢鼎銘赴安慶“乞師”，終使曾氏派出李鴻章淮軍進駐上海。光緒三年（1877）所立《錢農部請師本末記》殘碑對此事記載甚為詳盡。碑文稱錢鼎銘為“農部”，以錢氏曾捐得戶部主事之職故。此外，光緒八年（1882）所立《重修施氏家祠記》、民國二十四年（1935）所立的《重修天后宮記》等也都涉及晚清兵火給民眾帶來的災難。

民國時期的上海被譽為世界第六大都會，有着巨額的工商稅收和利潤，各方勢力無不對此垂涎三尺。而瀏河係上海的週邊重鎮，一向被視為上海的北大門，歷來圍繞上海的爭奪都不可能使瀏河所在的太倉置身事外。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爆發的“江浙戰爭”或稱“齊（燮元）盧（永祥）之戰”就是這樣一場以瀏河為主戰場的直、皖軍閥混戰。戰事延續了40多天，原先商貿繁盛的太倉被軍閥混戰蹂躪成為一片廢墟。其間，交戰雙方均以各種名目向當地商民敲詐勒索，或強徵民夫，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民國三十六年（1947）所立唐文治撰《楊君俊丞自戕殉職事記》，便追記了這樣一樁悲壯的往事：江、浙軍閥齊燮元、盧永祥混戰正酣

之際，時駐太倉蘇軍某旅長責令太倉警察所長楊瑛（字俊丞）限一日內拉民夫三百名以輸送彈藥，楊瑛不忍騷擾同鄉父老，遂飲彈自戕，某旅長亦爲之感動，遂罷拉夫之役。邑人感楊瑛“殉一人之性命，保全數百家之性命”，皆目之爲義士。

無獨有偶，民國三十六年（1947）所立《錢君詩儂殉職碑記》亦記載了在太倉發生的相似的一幕：1937年中日淞滬會戰爆發，時國軍欲徵太倉縣積穀移充餉需，而時任太倉縣積穀委員會職員的錢自輝（字詩儂）在滿足了國軍的需求後，卻難以面對“城空如洗，艱於應付”的困窘局面，遂投城河而死。錢自輝因此也被視爲“有氣節者”，並爲父老追悼紀念。

三

明清時期，太倉所在的蘇州府可謂江南財賦淵藪之地，也是全國最富庶的區域，而元代至明初的海上漕運，元代發達的海外貿易，更使劉家港所在的太倉的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起來。但伴隨商品經濟的衝擊，原有的社會秩序失範，也出現了種種新的社會問題。爲了協調社會關係，各級衙門在失範與規範之間的磨合過程中，加強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的正常運行。

本書所收錄的社會經濟類碑刻中，尤以涉及商業管理方面的數量最多。如太倉官場陋習成風，採辦物品時多假公濟私、用一取十，更有甚者以白條取物，鋪行遂不堪滋擾。康熙十六年（1677）《江南蘇州府太倉州申嚴擾累柴米鋪行碑記》即明令禁止借軍務或修造之名，以白條多取民物、中飽私囊事。由於商業的繁榮，附着於各行業，專以敲詐勒索爲生的流氓、惡棍也應運而生。據乾隆十七年（1752）取締在瀏河口設立海埠“橫徵剝削”的《太倉州奉憲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可知，清廷對於海商的管理尤爲嚴格，“開海舡必須身家殷實，取具地隣保結，方准編烙給照，呈明海關，給牌駕駛。非同內河舡隻，隨處攬載，漫無稽查者比”。但乾隆年間，出海口瀏河鎮“不意忽有游棍江三和、許永裕、張永吉、馬合順等呈縣創設海埠，勒索牙用，復私舉吳縣遊民馬琮培、毛硯偉充當”，此舉顯然對於基層的官府也屬有利可圖，竟然准予建立，於是海商在“上完稅課，下還水腳”後還要每兩銀被額外抽收三分，遂不堪壓榨，聯合上告，最終獲勝，官府因此發佈告示云：“永不許奸徒游棍藉詞創增海埠，希圖扣收牙用射利，累商滋事，各宜永久遵行。”性質相似的佈告類碑刻，還見有不少，如雍正四年（1726）所立《江南太倉州鎮洋縣禁恤商裕課事碑》、雍正八年（1730）所立《奉憲禁勒運費碑記》、乾隆四十四年（1779）所立《禁設瀏河莊船碑》、光緒九年（1883）所立《永禁船隻

進出口需索號費碑》等。

在社會經濟類碑刻中，涉及寺觀管理方面內容的，為數亦多。宗教行善助人的教義有助於官府維持社會秩序，故而統治者也樂見百姓“承帝澤而沐神庥”。太倉作為港口城市，各方文化交匯聚合，人們的宗教信仰呈多元發展，凡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乃至地方神祇，多有信眾。但元明以前的太倉宗教，仍然是佛教勢力獨佔鰲頭，這由太倉現存宋元以前古橋、古井多由僧侶倡建也可見一斑。又如趙孟頫撰並書的《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更是太倉現存最為古老的名碑之一。

但在商品經濟的潮流中，宗教場所往往亦不能免俗，如崇禎五年（1632）《太倉禮拜寺照單碑》碑文記述了崇禎年間蘇州府為修郡志對地方寺觀庵院進行核查，太倉禮拜寺以驗照合法而立此照單以為憑據事。據碑文所述，之所以要對地方寺觀庵院進行核查，是由於當時太倉社會“異術惑眾”並且為利益驅使“私創庵觀”的現象非常嚴重，故“為此單給本寺住持謹守”。由此可見，想必同時也有不少寺觀庵院係驗照不合法而遭取締的。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立《禁健訟之徒混控侵蝕劉河天后宮隙地租金碑》（本書第三五號），則涉及了瀏河天后宮前隙地捐建廊樓的租金用途的糾紛，至於民國十二年（1923）所立《太倉縣知事公署布告碑第一八五〇號》，則涉及太倉縣陸渡橋鄉圓照庵廟產基地十畝與上坵田七畝餘的產權糾紛。

此外，關於賦稅管理方面的碑刻，如明代《總督漕運軍門示諭》碑主要涉及對漕糧繳納的相關規定。康熙五十五年（1716）《奉憲劃定稅銀碑記》記載了杜絕地方假借名色苛索商民，重新劃定徵稅標準以恤商民之事。關於市政管理的碑刻，有清末所立《鎮洋縣正堂吳示諭禁止堆放垃圾雜物碑》，碑文明令禁止在鎮洋縣亭子橋北堆放垃圾雜物致礙通行。關於宗族管理的碑刻，有同治八年（1869）所立《永禁盜賣侵佔王念祖祖墳地產碑》，碑文內容為太倉州政府判定並保護前明官員王世貞家族祖墳地不受侵犯事，其中分明有“既不容不肖子孫盜賣，亦不准外人侵佔”云云。

明代中期以降，官商合流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以義莊為物質基礎的宗族保障系統日益發展完善。本書所收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太倉二原義莊奏諮全案碑》與民國十二年（1923）的《陳氏培遠義莊規條碑》，分別記述了候補知縣陸壽慈所創二原義莊與棄儒業商的陳祖邕所創培遠義莊的規條。義莊之“義”，“一則以濟貧為義，一則以親親之義”，故義莊

的建立雖然需要奠基於饒裕的經濟基礎之上，但更體現出了儒家文化的內涵和化育。而本書所錄明正統元年（1436）立於太倉文廟的《鎮海太倉衛建學之碑》、嘉靖五年（1526）《程子言箴殘碑》、清順治八年（1651）《太倉州增修學廟記》、乾隆二十四年（1759）《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同治十年（1871）《太倉試院碑記》、同治十二年（1873）《太鎮賓興公車稟定漕忙提捐章程碑》、光緒四年（1878）《永禁太鎮兩學稟膳銀兩由學承領碑》以及乾隆三十四年（1769）《勅建婁東節孝祠碑記》、光緒八年（1882）《重脩施氏家祠記》等，儘管立意不盡相同，但無不直接或間接反映出太倉地區崇儒向學的風氣。

除了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保障系統外，官方宣導、官民合作的社會保障體系也趨於成熟，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松江金山嘴、寶山薛家灘、太倉閱兵臺、上海高橋四處分別樹立的《壬申修築江南海塘紀念碑》，就記述了上海浦東同鄉會集議組成江南海塘工善後委員會，分段修築江南海塘之經過，碑文末深歎此等官商合作之明效，其用心可謂既深且遠。

四

太倉不僅是“漕舟之津”“商貨之區”，還是人文薈萃之地。繁榮的經濟，寬厚外向的民風，吸引了天下無數英才在這裡匯集。元明清時期，太倉的文化藝術隨經濟的發展而異常活躍，祖籍或客居太倉的鴻儒賢達不勝枚舉。如太倉墨妙亭即是鄉賢顧信為保存乃師、著名書法家趙孟頫的碑帖而構築，今存趙孟頫延祐五年（1318）書《歸去來辭》碑與皇慶元年（1312）書《送友人李愿歸盤谷序》碑即顧信所築墨妙亭內的存石原物。在《送友人李愿歸盤谷序》碑的末尾，趙孟頫曾憶及與顧信的交遊：“崑山顧善夫從吾遊甚久，於□頗信實，而又好學書。時時求吾書持歸刻石，故吾亦樂為之書。皇慶元年，吾在集賢，善夫以公事至都下，復□尋求書此文，不□卻也。夏四月九日，子昂。”短短數十言，道出了這位元代傑出藝術家與太倉的因緣所繫。此外，原先保存於太倉樊涇吳氏宗祠的趙孟頫臨褚遂良《枯樹賦》刻石，則是這位元代書壇盟主與太倉的又一段因緣佳話。

太倉自宋以來讀書之風綿綿不絕，所謂學而優則仕，讀書人為官為相者，代有不絕，甚而父子同朝竟至數代入仕的官宦世家，也並不鮮見。這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王錫爵與王掞祖孫。王錫爵貴為明萬曆年間首輔，其曾孫王掞則榮登清康熙年間大學士，被譽為“祖孫宰相”，一門二受兩朝罔極之恩，其貴顯可知。而本書所錄太倉一地與王錫爵家族有關的碑刻，竟然超

過了全書碑刻總目的十分之一，於此可見王錫爵家族在太倉的煊赫勢力與深遠影響。本書所錄與王錫爵本人有關的碑刻，有明神宗給王錫爵的手書示諭碑與王錫爵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另有王錫爵的門生故舊為王文肅公專祠所作詩文碑，包括何喬遠所撰《先師王文肅公像贊》、朱之蕃撰《王文肅公專祠詩》碑、婁堅撰《王文肅公祠堂詩》碑、唐時升撰書《王文肅公祠十五首》詩碑等。王錫爵之子王衡係萬曆二十九年（1601）會試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榜眼），而由於王錫爵本人係嘉靖四十一年（1562）會試“榜眼”，故人稱王錫爵、王衡為“父子榜眼”。本書所錄王衡行書詩碑有三種（本書第六七、六八、六九號），其中，《再過凡夫山居漫贈》係與著名篆刻家趙宦光（字凡夫）唱和之作，但文字與王衡《緱山先生集》所錄略有歧異，可資校訂。

前述與王錫爵有關的三種碑刻均由王錫爵孫、清初著名畫家王時敏經辦完成，其中，王錫爵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尚且是王時敏於天啟二年（1622）摹勒上石，讓人領略了這位婁東畫派的開創者、也是繪畫史上著名的“清代四王”領銜人物的不為人知的別一種技藝。本書所錄位於太倉南園的《鶴梅仙影記》碑，則借梅樹鶴影，道出了明清易代之際，曾率士紳出降滿清的王時敏不足為外人道的滄桑心跡。而康熙帝御臨董其昌《心經》碑、御臨趙孟頫詩碑、御臨黃庭堅《春近四絕句》詩碑、御書王維《金屑泉》詩碑等，皆以康熙帝御賜王掞及其子王奕清的墨跡勒石而成，不啻王錫爵家族由前朝舊臣向新朝顯貴華麗轉身的標志，較諸其父祖輩王時敏之流在鼎革之際的委婉心跡，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為“江左三大家”的明末清初的詩人吳梅村，是婁東詩派的開創者，他的詩作尤以七言歌行自成一體，其中多有以明清易代之際史事為題材，如以“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而為歷代傳誦的《圓圓曲》，非唯文詞清麗，音調鏗鏘，亦極具史料價值。清嘉慶三年（1798）所立的《重修國子監司成梅村公祠壁記》，則記述了清代“梅村公祠”的由來、頹敗和補葺過程，是關於詩人吳梅村的重要歷史遺存。

五

碑刻的刻工問題，夙為金石學者所關注。對歷代碑刻刻工的著錄，發軔於晚清，至曾毅公先生編纂、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石刻考工錄》一書，共搜集歷代刻工近一千八百人，引用碑目九百餘種。嗣後，各家又對新出土及公私舊藏碑刻文獻資料廣汲博取，陸續有所增補。但隨

着各地碑刻資料的不斷發現，對於碑刻刻工的採輯，仍舊是一項需要持續給予關注的有意義的工作。

以往學術界披沙瀝金撿拾所得的太倉碑刻刻工名錄，大約只有明代李俊、沈謨、吳應祈與清代張載德、張瑞玉等數人，可謂寥寥無幾。而從本書所收錄80餘種太倉歷代碑刻中，可檢出刻工18人（其中一人因碑文泐損無從辨識），除了張瑞玉所鐫《太倉州奉憲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與吳應祈所鐫《劉家河把總邵公去思碑記》外，其餘刻工或所刻碑目，率多可資拾遺補闕，殊值留意。

清順治八年（1651）鐫刻吳偉業撰《太倉州重脩文宣王廟記》（篆額《太倉州增修學廟記》）的張穎，雍正八年（1730）書鐫唐尊堯等立《奉憲禁勒運費碑記》的張志義，乾隆三十六年（1771）鐫刻《重建長安橋碑記》的張瑛，光緒年間鐫刻《永禁太鎮兩學廩膳銀兩由學承領碑》與《鎮洋縣示禁折田及串通礙租多案頂首碑》的張蘭坡，可能同屬曾活躍於清代的以刻碑為業的太倉張姓家族成員。其中，張志義還兼擅書法，本書所錄康熙五十五年（1716）《古興福禪寺飯僧田碑記》亦其所書。上述張姓刻工例不見載，與之情形相同的還有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唐文治撰文的《錢君詩儂殉職碑記》與《楊君俊丞自戕殉職事記》兩碑的刻工馬伯英。

元代刻工張應雷所鐫碑石，此前所見有至順四年（1333）閏三月刻《王德明造福壽橋記》、元統二年（1334）十月七刻《僧如理永安橋記》兩種，今可補入本書所收元統二年（1334）三月南廣壽寺住持圓智廣慈大師行滿題《重建眾安橋記》。

活躍於明嘉靖年間的刻工唐元祥，在《昆山見存石刻錄》卷三收錄其所鐫刻的三種碑志，分別是嘉靖五年（1526）春刻《昆山縣儒學重修記》、嘉靖八年（1529）十二月刻《明故唐處士伉儷墓志銘》、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刻《三貞贊》，但《昆山見存石刻錄》將“唐元祥”誤作“萬元祥”，今不僅可補入其人於嘉靖七年（1528）所刻文徵明書《重脩楊將軍墓廟記》，還可糾正《昆山見存石刻錄》著錄之誤。又，唐元祥題名前所書“玉峰”，即其籍里昆山的別名。

陸增祥撰《太倉試院碑記》碑陰之同治十年（1871）吳縣學生員曹澣書《捐銀細數、支用細數》，係出自“錢省三鐫”，而為錢省三所鐫刻的碑記，此前僅見同治六年（1867）的《改

建平江書院並祀文丞相石像記》。蘇州錢姓刻碑世家興起於清末，如光緒年間的錢新之、錢邦銘、錢邦鏜、錢朝章等。這一錢姓刻碑世家最爲知名者，當屬活躍於民國年間至解放初、曾赴南京靈谷寺鐫刻孫中山《三民主義》全文的錢榮初，至20世紀60年代由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撰、書的南京大學中文系胡小石教授墓志，其鐫刻亦出錢榮初之手。錢省三則可能是這一錢姓刻碑世家稍早湧現出的代表人物。

民國年間的無錫刻工邵晉康所鐫碑石，此前見有嵌於無錫蠡園千步廊的蘇軾《洞庭春色賦》等十八石、米芾法書十石、丹徒王文治臨鍾繇《宣示帖》和王陽明等所書十石，今可補入本書所收民國十二年（1923）畢光祖撰並書《懷貞堂記》。

由於蘇州地區刻字技藝精湛，師徒組合的作坊形式的刻字店也自清代後期開始逐漸興盛起來，集寶齋即是蘇州諸多刻字店鋪中的一家。集寶齋所鐫碑石，此前見有《吳縣新倉記》與章炳麟撰、于右任書的《張楚林墓表》兩種，今可補入本書所收唐文治撰文的《太倉殷烈婦碑銘》與《甲戌修築海塘紀續碑》兩種。

本書收錄太倉碑刻中，固以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所書兩種碑刻的刻工最值得注意。趙孟頫書法冠絕一時，出於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書法形貌神采的考慮，趙孟頫本人對於刻工亦有很高的要求。元明作家多次提到，慈溪籍的刻工茅紹之夙爲趙孟頫書碑的專用刻工，甚至有趙孟頫書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之說。不過，太倉的兩種趙孟頫書碑如顧信摹勒《歸去來辭》碑與《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卻都並非茅紹之所刻，如《歸去來辭》碑係出“吳天澤鐫”，無獨有偶，趙孟頫至治元年（1321）七月所書《平江路重修儒學記》碑的鐫刻，亦出吳天澤之手。

至於趙孟頫撰並書的《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碑末署“平江朱□鐫字”，其闕文左側爲“王”旁，右部較模糊，但據殘存筆劃隱約可辨或爲“圭”。元明之際，有崑山人朱珪，係彼時最傑出的刻工之一。朱珪兼擅書法、篆刻，與當時的文藝界名流有廣泛的交往，被譽爲唐代刻碑名手伏靈芝再世，而伏靈芝通常被認爲是唐代著名書法家李邕的化名，於此可見朱珪鐫碑藝名之盛。朱珪撰有《名跡錄》，以纂輯平生所鐫石刻文字，其所鐫文字最晚的一篇係收錄於《名跡錄》卷四的“洪武十年（1377）丁巳三月某日葬”的《楊子經墓志銘》，結合收錄《朱珪傳》的盧熊《蘇州府志》刊於洪武十二年（1379），遂可推斷朱珪約卒於洪武十年至十二年之間。關於朱珪的生年，文獻亦失載，程章燦先生據元代著名書畫家倪瓚題朱珪像及贈

詩的語氣如“朱翁業古藝，千古揚清芬”判斷，似乎朱珪尚年長於倪瓚，而倪瓚的生年一般被認為是大德五年（1301）至大德十年（1306），故推測朱珪的生年可能在大德十年甚至在大德五年以前。如果我們對《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係出“平江朱珪鐫字”的辨識不誤，那麼不僅可以斷定朱珪的生年確實在大德五年以前，也為朱珪生平交往的吳中文化名流如楊維禎、顧阿瑛、盧熊、倪瓚、吳睿、周伯琦等人之外，又增添了與趙孟頫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的一段因緣。

所謂“金石證史”，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刻碑紀事的傳統，故而關於太倉的歷史與文化，除了載錄史籍文獻或見諸考古遺存外，也銘記於市井街巷、寺觀庵堂間的或立或僕的碑刻之上，這些碑刻堪稱研究太倉歷史文化最直接、也是最值得珍視的原始材料。因此，秉持着保護、傳承地方歷史文化遺產的初衷，本書的編校者們剋服了碑石散布各地、碑文漫漶剝蝕、文獻查找不易等諸多困難，反復推敲，幾經覆覈，終究寫定了壹份相對完善的釋文。當然，本書所收錄的碑文，有的以前公開發表過，如《太倉州奉憲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整飭蘇松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熊公平海碑》《太倉禮拜寺照單碑》與明神宗賜王錫爵手書示諭碑等，我們參考了前人所做的工作，也糾正了一些錯訛之處。囿於認識水平，本書疏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和學界同仁不吝指正，謹此致謝！

本書編委會

2016年11月